

本书引发了一场革命。
——《纽约时报》



女 人 心 理 学

- 历史
- 原理
- 解决方案

For
Women Only



本书引发了一场革命。
——《纽约时报》

女人

心理卷

〔美〕芭芭拉·西曼
李斯等译著

- 历史
- 原理
- 解决方案

For
Women Onl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心理卷 / [美] 西曼著；李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

ISBN 7-5004-5346-9

I. 女… II. ①西… ②李… III. 妇女心理学
IV.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711 号

原书名: For Women Only!—Your Guide to Health Empowerment

Copyright @ 1999 Gary Null, Ph.D. and Barbara Seam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2-013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烟雨工作室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 编 100720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传 真 010-84017153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5
字 数 70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书评——再见了,可怕的过去/1

作者的话/2

第1章 天地之初 /3

夺回我们的身体

第2章 我想知道事实的真相 /92

第3章 走进女性的新心理(20世纪70年代) /143

第4章 性和高潮 /159

第5章 为人之母 /188

第6章 堕胎 /227

第7章 强奸 /240

第8章 穿白外套的女性 /252

第9章 关于做女人 /276

我们的身体

第10章 头发 /292

第11章 脸 /310

第12章 皮肤 /324

第13章 嘴 /341

第14章 躯干 /351

-
- 第 15 章 心脏 /357**
 - 第 16 章 乳房 /371**
 - 第 17 章 肌肉 /390**
 - 第 18 章 卵巢 /402**
 - 第 19 章 子宫 /409**
 - 第 20 章 子宫的果实 /436**
 - 第 21 章 阴道 /527**
 - 第 22 章 阴蒂 /531**

再论夺回我们的身体

- 第 23 章 乳腺癌行动主义 /558**
- 第 24 章 女性心理新探 /570**
- 第 25 章 性与生殖健康 /592**
- 第 26 章 再论为人之母 /602**
- 第 27 章 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 /632**
- 第 28 章 利益冲突 /667**
- 第 29 章 21 世纪的女权主义 /689**

书评——

再见了，可怕的过去

中世纪，有900万妇女被作为女巫活活烧死。这种由天主教堂煽动起来的女巫狂潮持续了几百年。其他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有记载。那时，被活活烧死的噩梦经常萦绕着那些努力夺回她们权利或者宣扬她们个人真理的女性们。我在工作中听到过无数次这种梦呓。有关那个残酷的焚烧时代的记忆压制了这些女人好几百年，但现在又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重新浮现。我们清理这些可怕的记忆，并使之转化。这样，在我们之间，女性能量与男性能量能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男人与女人也能平等地共创世界。

当一个女人着手治愈她的身体并说出它的真相的时候，她必须突破包围我们每个人普遍存在的恐惧，在过去五千多年的极权社会里，一直存在着这种恐惧。这是一个充满对强奸、挨打与被抛弃的恐惧的时代。

全世界的妇女都在寻找突破羞耻、恐惧与痛苦的方式。我的一位病人最近回到家中，面对父亲，勇敢地表达出多年来和姐姐一直遭受父亲凌辱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内心感受。她站在父亲的面前，说出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改变他，而是为了打破多年的沉默。她告诉我说：“我准备在全国性电视上说出这事，并不在乎提及我父亲的名字。他不但毁了我的少年时代，而且几乎凌辱了邻居的所有女孩。”这是迈向转变的第一步。一个女人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谈得上宽恕别人。因此，鼓足勇气吧，一旦摆脱了过去的枷锁并拥抱自身的力量，你将获得希望、快乐与爱——这些每时每刻都陪伴在我们身边。

美国“女人之家”健康治疗中心主任 克里斯蒂安·诺斯鲁普

作者的话

我有许多朋友都回忆说，她们过去常常交换彼此的私房话。典型地说，无论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羞耻感，都会一笔勾销，因为我们发现，个人的体验往往就是大家共有的遭遇。我记得这样的声音：“是啊，我搞了一次非法堕胎。”“是啊，我被强奸过。”“是啊，我的邻居（兄弟、父亲、叔叔、牧师、医生、老师）对我进行性骚扰。”“是啊，我假装有性高潮。”“是啊，我什么样的节育措施都试过，结果全都是一场灾难。”“是啊，我的妇产科医生让我很不舒服，但我又不敢说，因为人人都尊敬他啊。他搞的骨盆检查动作粗暴，接连几天让人拉屎都疼。”

女人们交谈，听人谈，并把话传开了。我们回到自己的社区，创立自己的女性团体，有做宣传活动的团体，有讨论组，有了解女性身体的课程。从1975年到现在，已经有近2000多家正式的女性自助项目分布在全美各地，还有数不清的非正式团体。

关于女性健康，女性现在彼此谈得比过去少吗？这样的可能性不禁会让人担忧。

如果我写这本书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女性看了这本书能够受到激发，彼此之间多谈一下事关自身的健康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谈得更多，因为在彼此之间谈论健康问题的女性，会继续在姐妹之间交谈别的话题。

亲爱的读者，我希望大家会觉得这本书既有启发意义，也是大家所熟悉的话题，因为它们讲述的都是大家自己曾有的感觉。我还希望这本书能够提高大家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做出有充足理由的决定，帮助大家保护自我，保护我们所爱的人的身体健康和最大利益。

——芭芭拉·西曼

第1章 天地之初

论母性

——伊丽莎白·斯丹顿

选自爱丽丝·罗西编《女权主义者文集：从亚当斯到德·波伏娃》，纽约，矮脚鸡丛书，1973年，第399—401页。最初发表在伊丽莎白·斯丹顿著《书信、日记及回忆录》中，纽约，哈泼兄弟公司出版，1922年。授权重印。

她的公众事业是“为女性投上一票”，然而，她的个人使命和私下里的信条却是“自力更生”，尤其是在身体健康的事情上。伊丽莎白·斯丹顿是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者当中最大胆和最有才华的一位女士，1815年11月12日出生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她出自富有人家，父亲是一位法官，母亲是一位有贵族血统的女性。全家一共有11个孩子，但只有5个女儿活下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伊丽莎白就师从姐夫爱德华·贝雅德研究了顺势疗法。1840年，她与亨利·斯丹顿结婚。斯丹顿是一位废奴主义者，奥柏林大学的共同创始人，也是西尔维斯特·格雷汉姆的信徒。西尔维斯特·格雷汉姆是一位富有领袖能力的讲座人，是格雷汉姆饼干的创始人，而且，根据史料记载，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加里·纳尔（他积极倡导每日身体锻炼，讲求平衡和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

有位邻居名叫阿米莉亚·布鲁默，曾在她转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的信封上写下这么一行字：“你走了以后，人们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是因为伊丽莎白通常总是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动的，哪怕自己有多么不受人欢迎。她的家乡拒绝为姑娘们提供有税款资助的体操课，她就把自家谷仓改造成一间体操房为学生授课，跟政府对着干。她有顺势疗法手册和辨识草药的本领，借此为自己和邻居的孩子们看病，帮助他们度过了疟疾、百日咳、腮腺炎和肢体骨折等，甚至还帮着接生。

在50多年时间里，伊丽莎白一直致力于女性完全平等权利的活动，没有什么障碍是她不曾加以注意并尽力加以排除的：除开投票权之外，她还为节育、妻子的财产权、母亲的监护权、平等工资权、合作式育婴所、男女同校就读权呼喊，甚至包括“与自封的医学、

宗教和司法权威们的专横之举解脱关系”。1948年8月2日，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她说：女性本身必须来做这件工作——因为只有女性才明白自己屈服和悲哀的程度、深度、长度和宽度。男人不会为我们说话，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我们和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材料制作出来的，因此他们自己根本就无法判断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意见。

在这一切的活动当中，伊丽莎白自己一直都是一位爱护孩子和有亲身体验的母亲，她一共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这些孩子出生在1842年至1859年之间，1842年她26岁，到1859年时，她已经43岁。据说，如果不是已经有身孕，或者正在哺乳期间，亨利（一位旅行在外的男人）每次回家她都会怀上孩子。她很喜欢跟孩子们处在一起（这些孩子自由成长，充满活力，自负心强，跟母亲一样），甚至都把自己的写字桌搬到了托儿所。

她最大的儿子丹尼尔（也叫“雷尔”）出生的时候肩膀错位，结果他使作为母亲的“自力更生”精神受到严峻挑战。她带孩子去看医生，医生给他上了绷带，结果却让病情恶化了。“我一向都有自己的想法”，她告诉亨利，“因此就拆了绷带，自己变成了外科医生”。

下面是斯丹顿亲口讲的一个故事，由她的两个小孩子编辑而成，一个是西奥多·斯丹顿，另一个是哈里奥特·斯丹顿·布拉奇。这两个孩子自己到了老年后，于1922年发表了这个故事，离他们的母亲第一次在沙地上画线以保护和保存他们的兄弟雷尔的事情已经有80年之遥。

——芭芭拉·西曼

护士很固执，医生也无知，我必须与这两种人斗争。孩子到了4岁，我们发现锁骨已经弯了。医生想给肩膀施加一些压力，因此就在腕关节上绑上了绷带。“就这样绑着”，她说，“绑10天就好了”。医生离开后，我立即注意到孩子的手都紫了，显示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这样可不行，”我说，“护士，取下来吧。”“不，真的不能取，”她回答说，“我永远也不能违背医生的命令。”我只好自己动手把绷带取下来，派人去另请一位据说更懂外科手术的医生。他看了感到万分奇怪，真不知道前面那位医生为什么要打那么紧的绷带。“这么做，”他说，“只能针对成人，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有可能会把他弄成残疾。”但是，他做的事情差不多一模一样，只是在手上而不是腕部打了绷带。不久我便看出，手指尖都紫了，这么绑10天同样会对孩子造成危险。因此，我把绷带取下来了。

“真是个怪女人！”护士惊叫，“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自己来想想别的办法，你拿枕头扶我坐起来，把孩子交给我。”她万分惊

讶地看着我。“我说啊，”这话是对她讲的，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们只不过是想在骨头上施加一点点压力而已，那两个人想干的事情不过如此。不把肩膀弄好，那怎么办得到了？”“我肯定搞不清楚这些事情，”她说，一边搓着双手一边满屋子乱转。“你拿3根亚麻带子来，扭成4根双股绳。”之后我折好一根，放在山金车油里和水里泡湿，之后搭在锁骨上，再把另外两根像吊带一样吊在肩膀上，前后交叉起来，把最后面的接头连在尿布上，这样可以提供所需要的压力而又不会压迫循环系统。吊好之后，她带着刚刚出现的一丝信任看着我，看起来很满足，因为一切都弄好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要把敷布湿几次，重新调整绷带，直到看起来像是炎症的现象消失。

10天之后，医生的两个儿子来了，他们给孩子进行检查，说孩子治好了。此时我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绷带没有绑好，并把自己做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彼此笑一笑，其中一个说：“嗯，无论怎么说，一位母亲的直觉总是比医生的理智更好。”“谢谢，两位先生。我可并不是凭直觉办事的啊。我想了很久才知道怎么样给肩膀施加一点压力又不阻挡血液循环，跟你们想的是一样。”这样，在我需要细心的关怀和支持的时候，在一个年轻母亲最重要的时刻，监管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在我的头上了，但是，虽然对自己每一个步骤的知识并不肯定，我还是得到了人要自信的第一个教训。从那以后，我并不绝对相信男人，也不绝对相信任何书本，无论是涉及天上的事情还是地上的事情，如果“理智”是太尊严的一个词语，无法用来形容一个妇女的思想，那我就利用自己当“母亲的直觉”办事。我给天下母亲的一个建议是：无论什么样的科学或艺术，首先研究怎么带孩子，在人类采取的一切措施当中都存在着无知，没有哪一种无知比对于这一点的无知更让人觉得遗憾的。

为什么伊丽莎白不在你的银圆上

——芭芭拉·西曼

作者专为本书而写的一篇文章，1999年版权。

1895年11月12日，是伊丽莎白·斯丹顿80岁生日。她坐在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上，有6000多人前来为她祝寿。在她身后的，白色的菊花丛中用红色的康乃馨拼出了她的名字，红色天鹅绒椅子两旁摆满玫瑰。接连3个小时，人们又是喝彩，又是致辞，又是献礼，包括犹他州来的摩门教女性代表团送来的一个黑宝石夹银色的投票箱。之后，斯丹顿站起身来，轻言细语地提醒自己的崇拜者：“我很清楚，所有这些公开的展示与其说是给我本人的献礼，倒不如说是给我所代表的伟大理想的奉献，那就是妇女选举权。”

两个星期后，她遇到了大麻烦。她的《女子圣经》出版了，很快成为畅销书，但是，根据她的传记作家伊丽莎白·格里芬的回忆，她被惊讶不已的公众斥为异教徒。《女子圣经》说：“今天，女子的地位仍然无法提高，主要的障碍就是所有国家的宗教分派给女性的屈辱角色，这就是说，女子是上帝造人时事后追加的东西，是罪恶的根源，为上帝所诅咒，婚姻对她就是处在从属地位的一个条件，为人之母是一种降格，不适合侍奉圣坛，在某些教会里甚至都不能加入合唱团。”伊丽莎白餐前的祝愿是献给“母亲与父亲上帝”的，她宣称自己信仰一位雌雄同体的创造者，并且说，逐出伊甸园的故事纯属虚构。女性不是被诅咒者，反倒是亚马逊社会的创造者与统治者，远在男性控制并征服女性之前。

女子选举权组织里的一些更年轻和更“实际的”领导层因为伊丽莎白“谤神不敬”的话而感到羞辱，因此对她敬而远之，她们相信，虽然她是这些组织的开创者，但已经使她们的事业受到严重威胁。“她们拒绝看我的信，也不理会我写给各次大会的决议，她们毫不留情地大肆批驳《女子圣经》。”伊丽莎白写道。苏珊·安松尼是伊丽莎

白的门徒，从小就与她合作共事，现在被推举为女子选举权的象征与倡导者。只有苏珊一个人的名字与 1920 年的宪法修正案联系在一起，她的头像刻上了纪念币，印上了邮票。

伊丽莎白死于 1902 年，距女性投票权实现的日子相差 18 年，离她首次要求女子选举权的日子隔了 54 年，与她遇到苏珊并请苏珊从事这项事业的日子相距 51 年。按照她的雌雄同体精神，伊丽莎白的葬礼在纽约市她的寓所进行的时候，由安托瓦莱特·布莱克维尔牧师协助的一名男士主持。她的墓地仪式则仅仅由一位女士主持，就是菲比·汉娜福德牧师。

尽管《女子圣经》引发(或导致)很大争议，到了老年，伊丽莎白的生活过得还是相当称心如意的。她的传记作家路易斯·班娜写道：“她这个人实际上并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她的本性是一个崇尚独立的人……政治活动讲求的方式是节制、妥协和不急不躁，这些并不适合她。相反，她是一位喜欢让同事震惊的人，刺激人们走出自满得意，给她们讲一些从来都不曾考虑过的问题，从而引发她们的激情……自从女性运动创始以来，她一直都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激进良知上……1848 年倡导女子选举权的时候，那是相当新颖和令人震惊的提法，但现在这个提案已经为所有女权活动家所接受，并且在美国各地得以实现了。”

下列这些选段，列出来是为了刺激读者，让大家走出自满的心态，让大家思考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而且还要让大家更强烈地意识到女子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力量与康复源自冲突：女性保健运动

——海伦·玛丽斯金德

据海伦·玛丽斯金德《保健制度中的女性：病人、供给者和计划》一书改编。

海伦·玛丽斯金德是《女性与保健》杂志的创始人编辑，她的姓氏用的是母亲玛丽的名

字，用以纪念自己的母亲（金德在德语中是“孩子”的意思。）她还以同样的奉献精神称赞了历史上许多超级明星式的女性治疗师的名字和著作（我说，姑娘们，你们觉得宾根的希尔德加如何？）

——芭芭拉·西曼

女子保健中的冲突与激进主义有很长历史，历史的问题总是与我们同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的接生婆被称为雅托罗迈艾，她们自豪地保护自己做外科手术和从事内科医疗的权利，使自己与严格意义上的产科医生的行医方法区分开来。希腊有很多医术高明的女医生，但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由于她们是堕胎者，由于希波克拉底的影响，也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发展，几方面综合起来就使这些女医生无法再行医了。妇女们在法院门前“抗议”，赢得了行医的权利，也使她们最喜欢的阿格诺迪丝无罪释放，而她就是因为像男人一样当产科医生而被逮捕的。

基督教的兴起使信教的男士更加深信，妇女应该远离公众事务和宗教事务，结果，针对女子在保健接生中的作用和保健的本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圣奥古斯丁曾写道：“受过教育的女性应该去照顾病人。”但是，在公元660年的南特大会上，女性被人称为“最无灵性的野兽”。从此以后几个世纪，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男性主宰了医学。

只有少数女性才得到教育，一般是有钱人家、贵族或神职人员，很多这一类的女性最后都转向了修女生涯，她们成为医疗界的传教团体，把修道院变成了治疗中心。例如，英国的沃尔帕加公主（约710—777）总是被人描述成手握尿瓶和绷带的样子，她自己在德国创立了一家修道院，在里面为穷人治病。宾根的希尔德加（1098—1179）以她有魅力的音乐最为人称道，当初她8岁就开始了修女生涯。1147年，到了50岁的时候，希尔德加在莱茵河畔的宾根地方新建了一所修道院。她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与教皇、皇帝和国王都有书信往来。她充满激情，有预言能力，发表了关于化学理论、血液循环、传染原因和自体中毒等的学说，说大脑是神经活动的起源。意大利萨尔诺的特诺图娜·迪·拉齐奥是一位产科大夫，据信，

她最早描述了梅毒的生理症状，当时还是公元 1100 年的中期，远在人们理解脓血症之前。她还倡导使用保护垫，用以防止分娩期间出现粪便污染。安娜·科门娜(1083--1148)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拥有 1.1 万张病床的医院里担任首席医生。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一方面是有学问的男性医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是对女性受教育权利广泛的剥夺，两者之间冲突不断。1100 年初，教会发布一系列训令，同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大学得到发展，成为男性的藏身地，还有很多基本上属于男性专有的行会和凭教会和世俗国家颁发的许可证才能经营的业务也得到发展，从而使这样的冲突激化。在保健领域，女性的角色仅限于当护士、接生婆、采药者、神职与世俗的乡村医生，有时候还当江湖医生。她们多半是些不懂医术的人，只能够师从受过大学教育的从业者。女性(和庸医)只能做简单直接的医护工作，处理伤口和感染，接骨打石膏。有学问的男性和只能做护理工作的女性之间出现明显对立，导致劳动的进一步分工，结果使女性治疗者基本上限于护理任务，而男性行医者就掌握着高级的专门领域。

雅可芭·菲律宾·德阿曼尼亞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1322 年，雅可芭因为违反了 1220 年的一项许可证法律在巴黎受审，她面临的不是无资格行医罪行，而是有大量证人证实和详细的行医纪录，证明她既有实际经验，也有医学知识。她辩解说，1220 年的许可证法是为“白痴和无知者”立的，这些人并不懂得医学这门艺术，但是，她本人却被排除在这些人以外，仅仅因为她有足够的技术和经验。她做了精彩的演讲，恳请由女性来照顾另外的女性，结果纪录在《巴黎宪章》的第 2 部分：

让一位聪明和有专业医学知识的女性去照看生病的妇女效果更好，更真实，也能够了解她们生病的隐秘原因，因为男性得不到许可，无法察看、问询和触摸女性的双手、乳房、腹部等。男性更不应该回避女性及其同伴的秘密，不可唯恐避之不及。

有些杰出的接生婆和女医生的确也在这段时期内保持下来。有一个时期，当英国和法国迫害女性医生的时候，意大利却不断出现一些重要的女医生。1390年，多萝茜娅·波齐在波罗尼亚被任命为医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并在那里执教40多年。一位现代人，那不勒斯的柯斯坦莎·卡伦达因为医学讲座而获得很高声誉。

到了16世纪，欧洲大部分学术中心排挤女性的传统已经牢固树立（意大利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外）。在中世纪欧洲的猎女巫狂潮中，在女性健康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有上千的女性被处死。大多数女性都是非医学圈内的女治疗师或替人接生的“老妇人”。这是相当重要的区别，因为虽然对行巫术的人进行的起诉有时候也对准更为人所接受的接生婆，但是，还有一些特别的条款是让她们去取得许可证的。例如，在1587年的英国，爱伦诺·普里德就得到了许可证，可能从事包括施洗在内的接生工作。

女巫审判对女性作为治疗者的地位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直接、首要和常常是私密的护理角色也伴随着很大危险，因此，很少有女性冒险行医，因为有被起诉的危险。穷人失去了他们的乡村医生，而教会和国家进行的专业控制也牢固树立起来。修道院里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行为，而在僧侣生活中，对于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兴趣也在不断下降，这期间，大学里面也在继续排斥女性，不让她们参与医疗活动，哪怕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另外，由于给某些接生婆颁发了许可证而不给另外一些妇女颁发许可证，这就使得女治疗者团体自身也发生了分裂和分层，结果使她们无法团结起来发出抗议。

当然，总还是有例外出现。从16世纪到19世纪，法国一些知名的接生婆一直都在接生。露易丝·布尔乔亚（1563—1636）定下了处理不同胎位的接生方法。安格莉克·玛格丽特（1712—1789）发明了女性躯干模型，并接到路易十六的命令，到各省去巡回演讲，免费给“没有启蒙的接生婆”进行讲授。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技术高明和有成就的接生婆得到很高待遇，她们的发现可以发表，她们的才能也得到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的认可和谋求，但是，在许可证和

接受大学教育的资格上，还是存在很大冲突。“科学院的接生婆们并不想要我。”布瓦凡夫人（1773—1847）自嘲地说。她是一位接生婆，她得到过皇家授勋，1827年还得到德国的荣誉医学博士学位，但是，法国医学科学院还是不允许她进入。

到18世纪末期，在欧洲各处，在女性行医者，尤其是接生婆的事情上，冲突变成了制度化的事情。在法国和德国，虽然有些女性行医者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有组织的培训计划还是导致了能力和受尊敬水平的普遍上升，结果，接生婆就成为现代保健制度的一个部分了。

但在英国，接生婆不仅仅不得使用比如助产钳等快速发展的科技仪器，而且还受到其他因素的阻碍，比如她们缺少组织，没有团体内的竞争，仅只能参加产科活动，而且还要受到教会和世俗国家以及许可证法共同发动的有财力支持和有组织的大规模攻击。像伊丽莎白·尼赫尔夫人、萨娜·斯通夫人和伊丽莎白·塞利亚夫人等接生婆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读起来色彩缤纷。1881年，罗萨琳德·佩吉特创立了接生婆学院，直到此时，接生婆才又正式成为英国保健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美洲的殖民地，有很多接生婆以自己精湛的艺术为自己的社区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有记载的第一位接生婆是布里盖特·富勒，是她在地权登记处登记的名字，她于1623年乘坐“安娜号”到达普利茅斯殖民地，与乘坐五月花号到达的丈夫萨缪尔医生会合。还有安娜·哈金森，她是一位接生婆，女性组织者，也是一位宗教上的不同意见者，在罗德岛共同建立了一处定居所。我们从1705年的一处墓志铭上了解到一位瓦亚特夫人，“她一共接生了1100多名孩子”。接生婆玛莎·巴拉德的日记后来改编成为一本现代书和一部现代电影，里面的描述生动地说明了在美洲殖民地当接生婆的艰辛和欢乐。

在美国，接生婆慢慢也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当女医生的地位也下降了，其中的原因跟在英国是一样的。当时的一些女医生很出名，也受人欢迎，哪怕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同样的地位，比如玛丽·拉文德医生（1776—1845），1814年，她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创立了一

家小儿科与接生医院，还有萨拉·亚当斯医生(1779—1846)，她也在佐治亚州行医。同样，哈里叶特·汉特(1805—1875)也在波士顿行医，吸引了大批信徒，哪怕她并没有拿到学位。奥利佛·文德尔·霍尔姆斯支持她申请进入哈佛医学院，而哈佛医学院的教师从学院的章程里也找不出任何条款否认她上学的权利。不过，汉特被迫收回自己的申请，因为学生形成了一项决议：“我们反对与强加在我们中间的任何女性为伍，此人倾向于去除自己的性别，牺牲自己的端庄举止，因为她准备跟男性一起出现在教室里。”

在美国，关于女性保健的事而发生的大冲突，是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大众保健运动中形成的，这项运动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一股针对职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潮促成了大众保健运动的成长，而且当时的许可证法也很松弛，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许可证法。人们广泛认可家庭治疗和身心协调作用，普遍相信只要有能力证明自己有治病技术的人，都应该允许行医。女权主义者、女性行医者，比如哈里叶特·汉特和工人阶级激进分子联合起来参加了大众保健运动，抵制当时大多数医生的傲慢情绪和低下医术。

在19世纪中期及接下来的日子里，女性被广泛看作是天生多病的人，本·巴克一本菲尔德在《一知半解的人生恐惧》一书中就是这么纪录的。大众保健运动产生了一个分支机构，称为女性生理改革协会，为了保护自己，这个协会的女性进行了很多明智、然而也很激进的演讲，比如讲求个人卫生和经常洗澡、预防性的保健、基础解剖学、女性着装要宽松(时髦女性穿的用鲸须制作的紧身胸衣会严重地挤压内脏)、戒酒、有利健康的饮食习惯，包括整粒谷物等，还有性生活及节育等方面的话题。节育以及女性的节育权一直都是引起极大争议的话题，直到1965年在康乃狄格州废除康姆斯托克法中最后的条款为止。大众保健运动的各个分支机构创立的各种女子医学院为妇女提供讲座，以利改善她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态，同时，女毕业生也经常在各个社团里授课。莉迪娅·福勒(1822—1879)就是这样的教师之一。1851年，她被任命为罗切斯特折中派医学院的